

日本丛书

日欧比较文化

〔葡〕路易斯·弗洛伊斯 著

〔日〕岡田章雄 译注

范 勇 张思齐 译

南

Luis Frois
KULTURGEGENSÄTZE EUROPA-JAPAN

1585

据日本岩波书店 1965 年出版的

冈田章雄译注本译出

日本丛书
日欧比较文化
〔葡〕路易斯·弗洛伊斯 著
〔日〕冈田章雄 译注
范 勇 张思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72-3/K·171

199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9 千

印数 0—2 000 册 印张 4 1/4

定价: 2.60元

62962
05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译 序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遍游中国,留下了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在他之后约两个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来到了日本,同样留下了他在日本的见闻录《日欧比较文化》。不过,这两本欧洲人写成的有关东方的书,其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可·波罗行记》成书后很快被人们争相传诵,而《日欧比较文化》却历经数世纪,直至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刊行。

路易斯·弗洛伊斯是最早来到日本的欧洲传教士之一,他在日本长期居留达几十年,是一个有名的“日本通”。在日期间,他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报告和著作,《日欧比较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日欧比较文化》是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多年的经历、见闻、观察和比较的汇集,是研究当时日本民族的思想、宗教、风俗、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而且也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早期著作之一。

路易斯·弗洛伊斯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也避免不了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商人、殖民地官员和旅行家们对欧洲以外民族的猎奇心理的影响。出于对欧洲人与日本人之间所存在的倒置、差异深感兴趣而写下的这本书,自然在观察事物和对比材料的取舍上受到了局限。尽管如此,弗洛伊斯的这本书开创了日欧比较文化研究的先河。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民族的名著《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要早4个世纪。其筚路蓝缕之

功不可泯灭,仅就此点而论,《日欧比较文化》一书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日欧比较文化》一书的学术意义,我们认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展示了日本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并与之融合之前的原貌。

明治维新以来,在世界史上长期沉寂的日本民族便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并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但真正科学地开展对日本民族的研究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人们有感于日本独特的民族性及其适应世界的能力,纷纷探讨日本如何成功地将西方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原因。

然而,什么是日本传统文化即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人们常常注意到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而忽略了日本本身的固有文化;人们普遍重视日本国民精神的研究,却缺乏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历史探讨。通过《日欧比较文化》一书,我们便能对日本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之前的原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6世纪)的日本,其文化呈现出一种复合文化的面貌。即在日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大陆区域文化因素。

外来的中国文化因素主要有,儒家思想及伦理观念、文学、文字、书法、工艺美术、水墨画、医学、书籍的印刷和装帧、饮茶之风习等等。外来的印度文化因素主要是佛教,这是通过中国和朝鲜传播到日本的。日本本土文化要素主要有,原始宗教神道、祖先祭祀与氏神崇拜,自耕自足的农耕经济,注重群体、维系血缘的家族组织,好勇善斗、重女轻男、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的社会风习,以及注意人与自然协调的观念等等。明人罗日褫的《咸宾录》记述

16 世纪的日本时说：“土气温暖，宜禾稻，无牛马虎豹羊鹤。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人性嗜酒，多寿考，其至百余岁者为常。男女相悦为婚，人皆多妻，不淫不妒。又俗不窃盗，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大者灭其门户。其死丧无异中国。灼骨以卜吉凶……男子魁头断发，黥面纹身。妇女披发跣足，间用屐。信巫好戏，重儒敬佛。其接见以蹲踞为恭，以搓掌为悦。饮食藉以櫛叶手铺之，或间用筵豆。坐卧无几案，床帐编草为荐，文皮为表，席地坐卧。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这段有关日本世俗文化的中国历史记载，正是日本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前较为真实的写照。不过，由于中国这类有关日本世俗文化的历史记载过分简略，人们很难据此来把握 16 世纪日本世俗文化的全貌，更难以对日本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历史的探索。而《日欧比较文化》一书中大量的、较系统的历史记载则弥补了上述研究资料的不足，并有助于人们对日本现在的文化、日本的民族性及其适应世界形势的能力等现实课题的研究和思考。因为日本安土桃山以及德川、江户时期的世俗文化，正是日本文化发展演变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二有助于澄清日本“儒家文化”的实质。

长期以来，人们常把日本划入“儒家文化圈”，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类型，因而常常忽略或混淆了中国与日本的儒家思想的区别。事实上，在某些重要方面，日本的儒教极不同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最初，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家信奉同样的准则，但是，基于不同的本土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对这些儒家思想准则作出了不同的研究和解释，其结果是，在日本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民族精神、国民性与民族心态。《日欧比较文化》一书中所反应出的日本世俗文化正表明了这一点。

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且相信仁是人

类本质的美德,因而强调道德治理家国的原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并把“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日本的儒教却忽略“仁”而强调忠诚。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乃是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

日本儒教的主要范畴是“忠”而非“仁”,这是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即使是忠,其意义在中国和日本也不相同。“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被理解为“臣子必须以不违背‘仁’去侍奉君主”,而日本则被解释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主君奉献一切以至生命”。为主君尽心效力的忠诚,在《日欧比较文化》中多有记载,屡见不鲜。比如当战斗进退维谷陷入绝境或城池陷落之时,常有侍从仆从随同主君剖腹自杀。“忠”以致被视为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儒家思想这一构成中国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从来就不强调“勇敢”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中国的儒家思想认为,个体人格的修养达到“仁”,便会具有超乎寻常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因而并不着意去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的儒教则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为武士阶级所推崇和遵循。《日欧比较文化》中就常有日本男子显示勇敢的情况。比如在“男性的风貌与服饰”一章中记载了日本武士夸耀脸上的刀疤(“向疵”),鄙视脑后受伤的情况。对日本武士阶级而言,其个人品行的修养,除了“忠”之外,就要数“勇敢”了。

中国和日本对儒家思想准则的理解和解释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儒家伦理观念的保持和对待上。中国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日本武士阶级对此是接受的。镰仓幕府1232年制定的宪法《贞永式目》明文规定,臣对主要忠,子对亲要孝,妻对夫要顺从。尽管如此,日本的伦理纲常与中国儒家的伦理

纲常还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在夫妻关系方面。例如妻子对丈夫的人身依附要小，人格要相对地独立些。比如《日欧比较文化》中第二章“女性的风貌和风习”中就记载了16世纪的日本家庭里，财产为夫妻各自所有，妻子甚至可以向丈夫发放高利贷。而且妻子被休并不被社会视为不名誉之事，再婚也并不困难。也有妻子主动离婚的。这种“夫为妻纲”伦理观念的差异，应该说与日本本土文化背景有关。在日本，性关系一直未受到严格控制和禁忌，妇女人格的相对独立，一方面是受到社会上性关系较自由的传统影响，另一方面也适应日本男子“多妻妾”和更妻的需要。

中国与日本“儒家文化”的区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士庶官僚的儒家思想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武士阶级的儒教国家。

三为东西方文化比较提供了可据资料。

日本传统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具有东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近代，日本文化包括其中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行为模式，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融入了不少西方文化的成分，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代日本文化，并成为促使日本近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日本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因此，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就不能不重视日本文化的演变过程。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可以从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其基点是正确了解这两大文化的原有内涵，即同样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原貌。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才能正确了解两大文化的长处与不足，才能正确估价在新的工业技术革命浪潮中两大文化的不同结构及其影响。

《日欧比较文化》展示了16世纪日本与欧洲(笼统而论)文化

的原貌，提供了东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点。使人们从日欧比较文化中得以窥视到东西方人在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传统及其差异程度的了解，探索和研究东西方文化结构及其内在活力。

《日欧比较文化》除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外，还是一本很有趣味性的书。书中涉猎范围很广，对 16 世纪的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所记述，诸如人种体质特征、服饰、住宅、饮食、兵器、书法绘画、戏剧艺术、宗教、交通工具等等。由于作者是西方人，看问题的角度与东方人不同，因而全书特别注重并强调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倒置性差异，读来给人印象很深。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颇具学术价值的书，同时又是一部很有趣的读物。基于这种看法，我们译出这本书，将它献给读者。翻译的底本用的是 1965 年首次以日文形式刊行的冈田章雄的译注本。日本学者冈田章雄先生在参考上智大学版本将《日欧比较文化》译成日文的同时，增加了大量日本方面的资料，并作了精心铨释。他的注释使得路易斯·弗洛伊斯的原书更加充实完备，二者相得益彰。中译稿承姜晚成先生校阅一遍，谨表谢意。我们的译文尽可能忠实、简洁，如能得到读者们些许首肯，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译 者

1987 年 8 月 20 日于成都

目 录

《日欧比较文化》题解·····	冈田章雄	1
自序·····		4
第一章 男性的风貌和服饰·····		5
第二章 女性的风貌和风习·····		20
第三章 儿童及其风俗·····		35
第四章 僧侣及其风习·····		40
第五章 寺院、圣像及宗教信仰·····		49
第六章 日本人吃饭和饮酒的方法·····		54
第七章 日本人的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附战争·····		63
第八章 马及马具·····		71
第九章 疾病、医生和药剂·····		78
第十章 日本人的书法、书籍、纸张、墨水以及书信·····		83
第十一章 房屋、建筑、庭园和果品·····		89
第十二章 船舶、航行习惯及船上工具·····		97
第十三章 日本的戏剧、喜剧、舞蹈、歌曲以及乐器·····		103
第十四章 前面各章没有谈到的奇风异俗和特殊情况·····		108
后记 路易斯·弗洛伊斯和《日欧比较文化》·····		120
参考书目·····		122

《日欧比较文化》题解

冈田章雄

英语中有 topsy-turvydom 一语，是颠倒、倒置、相反之意。幕府末期及明治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访问日本，介绍当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时，常常用这个词。如果以西洋的事物为前提来观察日本的事物时，确实会发现倒置的事物很多，感到相反的东西不少。在欧美人的访日著作中把这些事物作为极其奇妙的现象，从趣味本位出发而加以列举的记载很多。明治中叶，B. H. 张伯伦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师，著有《日本事物》(Things Japanese)一书(1890)。书中，特设 Topsy-turvydom 一项，列举了许多实例。著者写道，有个东京女性问他，为什么外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和日本人的做法相反。这的确只是由于传统和习惯的不同，如果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看，一定会感到西洋的许多事物是颠倒的。

这里翻译介绍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 1532—1597)的《日欧比较文化》是研究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所存在的颠倒、不同的最古老的记录之一。路易斯·弗洛伊斯是葡萄牙人，十六岁时加入耶稣会，渡海来到印度的果阿，进入圣保罗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遇见日本人保罗·弥次郎(斡旋方济各·沙勿略来日本传教的萨摩藩武士)，又从方济各·沙勿略^①那里听到

^①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 1506—1552) 西班牙传教士，参加创立耶稣会。1541年以后，以果阿为中心传教，天文十八年(1549)从鹿儿岛踏上日本国

了许多日本的情况便燃起了前来日本传教的希望。弗洛伊斯作为神父来到日本是永禄五年(1562),先在北九州地方传道,永禄七年(1564)受命赴京都,帮助在那里进行传教活动的伽斯帕尔·比勒拉^①神父。在此期间所写的报告中,他对京畿地方的文化及风俗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参看《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京畿编)。后来,他被赶出京都,在堺城避难四年。永禄十二年(1569),谒见织田信长,返回京都,受到优遇和保护之后,在传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天正四年(1576),他移居丰后,主要在大友义镇手下生活了四年。由于耶稣会巡察员亚历山大·布瓦利尼亚诺来到日本,弗洛伊斯作为翻译再去京都,于天正九年(1581)谒见织田信长,接着,还在越前国北庄访问了高山飞騨守。这是传教士首次来到越前(本书第八章《关于马的记述》中,出现了越前。这可能是根据当时的见闻)。

天正十四年(1586),弗洛伊斯随同副教区长伽斯帕尔·柯厄略巡视各地,在大坂谒见丰臣秀吉,受到款待。翌年,丰臣秀吉讨伐九州,接着就颁布了著名的“传教士追放令”,^②后来,弗洛伊斯主要住在加津佐、长崎等地。庆长元年年底,他在长崎目击了二十六位圣人殉教事件。当年他六十五岁,与世长辞。弗洛伊斯是喜好写作的传教士,留下了大量的长篇报告,著有大部头的《日本史》。这些报告和《日本史》当然是了解基督教传教活动成果的重要史

土,在平户、博多、山口、京都、丰后、岛原、大村等地传教。在日二年三个月。1552年病死于广州附近的上川岛。——译者

① 伽斯帕尔·比勒拉(Gaspar Vilela, 1524—1571?)葡萄牙传教士,耶稣会士。1556年赴日本,在丰后、平户传教。在日十五年,先后赴京都、堺城、奈良、长崎、福山等地传教。1571年因体弱去印度,死于同地。其书简收于《耶稣会士日本通信》中。——译者

② 日文汉字“伴天连”,是葡萄牙文 padre 的译音,本指神父,泛指传教士。“传教士追放令”即“驱逐神父令”,是锁国政策的一部分。——译者

料。同时，也是作者从第三者立场出发，对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等所作的客观的记述，关于文化、社会、思想、宗教、生活、风俗也有极为具体的记录，是很难得的史料，对日本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作用。

这部《日欧比较文化》，正如序文所说，是天正十三年(1585)在加津佐写成的，虽然不过是一本小册子，却证实了著者多年的经验和多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值得珍视的、充满浓厚兴趣的记录。不过，它却同《日本史》一样，数世纪也没有刊行，直到今天。弗洛伊斯的亲笔草稿，现还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市历史科学院的书架上。该书稿共40页，写在日本纸上；装订成册，纸页长22厘米，宽16厘米。约瑟夫·弗郎茨·休特(Joseph Franz Schütte)于1946年在该书库中发现了这部草稿，在作了书志学的考证和研究之后，在葡萄牙原文旁边添注了德文译文，并就内容加上详细的注释，于1955年题为“Kulturgegensätze Europa-Japan (1585)”(《欧日文化对比》)，由上智大学出版。现在这个日语译本是根据葡萄牙原文译出的。翻译时，有赖该书之处很多，谨向休特先生表示感谢。

这部《日欧比较文化》是由耶稣会屈指可数的日本通弗洛伊斯于天正年间写成的，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欧洲人以好奇眼光写出的 topsy-turvydom，可以轻率一读而过。原文的一行行都是阐明安土、桃山时代社会、生活、风俗史的重要史料。因此，我们在这部日文译本中，尽量针对其内容，列举了日本的史料供参考，并尽量附上详细注释，以便彻底理解原文。不过，问题涉及东西双方和一切领域，深感力不从心，没能作到十分满意，深感遗憾。或许还有重大的误解，内心不胜忡忡。我们衷心希望，各方面的专家今后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钻研和考证，使这部生活史、风俗史、关系史的宝库——贵重记录有朝一日真正成为学术界共通的财富，得到充分的利用。

自序

谨将此书献给耶稣和圣母玛利亚

这是一本小册子，记述了欧洲人和日本人在习惯方面的对照和存在的差异。不过，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日本人和我们欧洲人一致。可是，这些事情并不是日本人中间共通的、一般的东西，而是日本人在和渡海前来做生意的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过来的。他们的习惯和我们欧洲人相差悬殊，迥然不同，相距很远。在这样文化发达的、创造力旺盛的、具备自然知识的人们中间，居然竟有如此极端的对照，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为了避免二者相互之间的混乱，在得到天主恩惠之后，按章分类加以叙述。

1585年6月14日执笔于加津佐

第一章

男性的风貌和服饰

1. 欧洲人大都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日本人在身高和体格上都比我们差。

注 现代日本人的身高和体格与16世纪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兹引当时史料以供参考。纪德·瓜鲁切利^①评论日本访问罗马的少年使节团说:“他们的身高比中等身材的欧洲人略低,这是由日本人的本性决定的。日本人一般都不高大。”当时日本少年使节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

2. 欧洲人认为大眼睛美丽,而日本人则认为大眼睛可怕,而眯缝的眼睛美丽。

注 因为欧洲人眼脸上的脂肪组织少,故双眼皮居多,睫毛显得长,而且上眼皮凹陷进去,一大睁开,内眼角就现出红色的泪阜。日本人的眼睛则上眼皮脂肪多,眉棱骨不突出,鼻根部低,所以单眼皮的居多,睫毛也不太明显。瓜鲁切利就曾记述说,日本少年使节团成员们眼睛小,目光锐利。为了使眼睛显得大,欧洲人还用蓝、紫等深色颜料化妆上眼皮。日本人往昔有在上眼皮上抹胭脂的化妆法,认为眼睛细小美丽。

3. 欧洲人对灰白眼珠并不感到奇异,而日本人却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在他们中间灰白眼珠是少见的。

注 瞳孔周围的圆形的虹膜部分,因色素的多少而颜色各异。色素多就呈黑色,色素少就呈亚麻色而渐淡。欧洲人喜欢碧眼,日本人则喜爱圆黑眼珠。因为黑眼珠一小,白眼珠(巩膜部分)就多,看起来就冷峭而锐利。白眼珠湿润带白光,给人以好像白瓷器那样的冷峭感。这是日本人视之为

^① 纪德·瓜鲁切利(Gualtieri, Guido)16世纪末意大利的文学家。曾得到教皇西斯图斯五世的信任。日本九州少年使节团访问罗马时,他写作、出版了这次使节团的纪行(1587年)。在日本使节记一类著作中,它是最准确的史料。——译者

心术不良的一个理由。在日本人的语言中,常用“以白眼相待”,“白眼视之”之类的语汇来表示瞪眼或睨视。在欧洲则没有这种表现。

4. 欧洲人的鼻子高,有的人是鹰鼻。日本人的鼻梁矮,鼻孔小。

注 鼻梁呈直线,笔直,鼻根部没有多少凹陷的直鼻(西洋美术视之为最理想的希腊鼻)、所谓罗马鼻和钩鼻、鹰爪鼻、被称为犹太鼻的鹰鼻等是欧洲人中常见的鼻形。而在日本人中,多是鼻孔向前开放(俗称扁平鼻子),或者是棱角少而溜圆的所谓蒜头鼻子。日本人的鼻孔也较欧洲人的小,而且鼻子下端宽阔(瓜鲁切利语)。并参见第十四章 47 注。

5. 欧洲人大都蓄有很厚的胡须。日本人一般胡须少而且形状也不好看。

注 在欧洲,特别是贵族有留须、髭的风习。而所留胡须的形状也有流行样式。据《庆长见闻集》“现今男儿无髭”条载,天正年间,留髭之风一度流行,但留须的很少。《醒睡笑》第一卷载,人们素称“美髯”的诸侯是“唐物”,意思是大唐人的胡须。

6. 欧洲人以胡须来显示名誉和优越。日本人则凭结在后头部的很小的发结来显示名誉和优越。

注 参见第 7 条注。

7. 欧洲人去理发时,若剃成秃头,则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日本人则自己用镊子将头发一根不留地全部拔掉。在拔头发时,会疼痛得流泪。

注 路易斯·弗洛伊斯在 1565 年(永禄八年)二月二十日寄给在中国及印度的传教士、牧师的信中说:“(日本)男子露着头,是秃头。他们用镊子不断地拔头发,感到疼痛而流泪。只在后头部留下一绺头发,结成发结,对之非常珍视。”《庆长见闻集》载:“愚老年少在关东都不用剃刀剃前额发和头发,而用大镊子拔,拔头发时头上流出黑血,十分吓人。”这种拔头发的工具写作“镊子”,就是“鼻毛镊子”。

8. 欧洲人男女均多雀斑。日本人虽然面色也白,但雀斑却很少。

注 瓜鲁切利记载说：“据说日本很冷，所以日本人肤色白，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日本少年使节团经过长途旅行到来时，肤色多少改变了，成了橄榄色。”当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们说日本人肤色白，或许是与黑人、印度人比较而言。比起黄种人来，白种人皮肤黑色素多而形成雀斑或褐斑，引人注目。

9. 在欧洲人中，有痘痕的男女轻易看不到。而在日本人中，痘痕很普遍，许多人因患天花而失明。

注 天花起源于印度，8世纪时传入日本，也称痘疮或疮疮，后经阿拉伯、埃及，于10世纪时侵入欧洲。在日本，天花和麻疹都是儿童易患的病。所以，有“痘疮定容貌，麻疹定命运”的谚语。痘痕脸并不希罕，因患天花而失明的人很多。

10. 欧洲人认为指甲长了不洁净，是没有修养的表现。在日本，贵族男女中却有人留着鹰隼爪子似的长指甲。

注 说日本人有留指甲的习惯，恐怕有些夸张。不过，日本有这样的风俗：有忌讳剪指甲的日子；认为夜里剪指甲不祥；出门旅行时剪指甲称为“出爪”，表示忌讳。

11. 欧洲人认为脸上有刀痕丑陋。日本人则夸耀脸上的刀痕，因为不好好治疗，越发显得难看。

注 日本武士把在战场上和敌人面对面战斗而在脸上留下的刀伤称为“向疵”（正面伤疤），认为是一种荣誉。反之，把背后的伤疤称为“后疵”（背面伤疤），认为是卑怯耻辱。

关于男子的服饰

12. 欧洲人的衣服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一样。日本人在一年中三次更换衣服，即夏天穿麻布单衣，秋天穿夹衣，冬天穿棉衣。

注 欧洲男人服装也有冬夏的区别，但样式一样。在日本，男女都有按夏、秋、冬三季更换衣服的习俗。在4月1日穿夹衣，5月5日端午节后穿麻布单衣，9月1日又穿夹衣，从9月9日（重阳节）开始逐渐穿棉衣。